

# 劉曉波

## 中國當代政治 與中國知識份子

2010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民主鬥士

劉曉波 博士 經典著作



無庸置疑，知識份子需要忠誠，需要社會良知，但是，知識份子的忠誠在任何層次上都不是對政治權力的忠誠，而是對自身的信念，對法律的忠誠。

我認為，知識份子的忠誠是建立在獨立的人格之上的……

為人民服務與忠於黨、為政治服務一起，

把中國知識份子本來就日趨萎縮的自我，

變成了毫無自我知覺的動物性存在。

知識份子要傾聽整個社會的每一個聲音，觀察每一個眼色，

但是就是從不傾聽知識的聲音……

**劉曉波**

**中國當代政治  
與中國知識份子**

唐山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劉曉波 著

一 臺北市：唐山，2010.11

176 面：21 X 15 公分

ISBN 978-986-6552-72-4 (平裝)

1. 中國大陸研究 2. 中國政治制度 3. 知識分子

574.1

99020572

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 2010 劉曉波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rinted in Taiwan.

## 中國當代政治 與中國知識份子

作 者  
責任編輯  
出 版

劉曉波

李福鐘

唐山出版社 | Tonsan Publications Inc.

1064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 B1

tel (02)2363-3072

fax (02)2363-9735

tonsan@ms37.hinet.net

<http://blog.yam.com/tsbooks/>

副撥帳號 05878385

戶名 唐山出版社

發 行

正港資訊文化有限公司

10660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64 號 B1

tel (02)2366-1376

fax (02)2363-9735

出版日期

1990 年 05 月 初版

2010 年 11 月 二刷

定 價

220 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如有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

此書獻給我的妻子陶力！  
儘管我知道，這本書  
遠遠無法補償她為我做出的一切。

# 前 言

經過十年“文革”和十年“改革”，中國現行的專制政體之腐朽，已經是昭然於天下的事實。從1949年到1987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昏聩而又殘暴的專制政體之中所遭受的種種迫害，也已經盡人皆知。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坎坷命運，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荒誕劇。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未成爲一種與專制政體相對抗的獨立的社會力量，而是專制政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基礎之一。每一次整治知識分子的運動都有知識分子的主動參與；每一次迫害過後，基於個人恩怨的訴苦代替了對自身命運的自覺反省，基於尋求民主的忠誠代替了對專制制度的批判，基於逃避責任的自我美化代替了對自身責任的反思，基於向上爬的野心的獻媚代替了社會良知的覺醒。1976年“文革”結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文革”、“反右”、“批胡風”等政治運動的控訴和批判，既是祥林嫂式的“抗婚”、“捐門坎”，又是阿Q式的“唯我獨大”。二者合一，便是以乞丐式的請求和忠誠來感化獨裁者，以當婊子立牌坊的狡猾來美化自身。淚水和唾液、憤怒與虛榮、虔誠與投機……混合起來，淨化出一種虛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覺。這一切使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變得頗爲滑稽。一方面是司馬遷所早就指出過的“娼優”地位，另一方面是唯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救主的天降大任。儘管從魏京生到方勵之，反抗始終存在，但是這種反抗與愚昧而怯懦的知識分子群體相比，就顯得

## 2 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過於渺小。換言之，經歷了多次劫難的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達到群體性的自覺。發生於1989年年初的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簽名運動，儘管是1949年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行動的首創，但是對於其價值不可估計過高，對未來的前景也不可盲目樂觀。在這種團結一致的深層，隱含有各種各樣的動機，而且，與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波蘭的“團結工會”以及南韓、台灣等地的民主運動相比，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行動，實在不值得過於自豪。當然，我並不否定這次簽名運動的積極作用，並希望在這個良好的起點上達至更高的水平。千萬不能一簽上名就自以為是蓋世英雄，就拿出一種隨時準備大義凜然的姿態向社會展示。如果從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社會良知的角度看，簽名是一個關心社會政治的知識分子最起碼的責任與義務，就像捍衛知識的獨立性是知識分子的份內職責一樣。

獨裁式的政治權力是個只懂暴虐而不懂知識，只玩陰謀而不懂人性，只要功利而不要正義的惡魔。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荒謬之處就在於全身心地愛上了這個惡魔，為之生、為之死、為之搔首弄足，為之出賣一切。政治權力，是中國知識分子擺脫不掉的先天怪胎，有形無形地左右著他們的一言一行。這就是我在本書中集中批判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性人格。知識分子的政治性人格是相對於知識性人格而言的。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 在社會地位上，政治性人格的知識分子必須依靠於某種社會的政治力量，因而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份子則不依靠任何其他的社會力量，只憑藉他們所擁有的

知識便能取得獨立的社會地位。

2.在倫理的或人生的價值取向上，政治性人格的知識分子不是把創造知識、傳播知識、研究學術作為第一位的自足的人生價值，而是把通過知識來獲取政治權力視為人生的首要目標，學術研究，藝術創作不是目的，而是從政的手段。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分子則把創造知識和傳播知識視為首要的、自足的人生目標，為知識而知識，追求知識是他們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3.政治性人格的知識分子，由於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和以知識為首要價值的人生選擇，因而他們所學的知識大都與政治密切相關，他們攝取知識的角度、方法和範圍受到先在的政治目的的制約，不可能獲得獨立於政治的知識（中國古代的科舉制所確定的讀書範圍就是最典型的表現）。換言之，他們是從政治的角度、以政治為目的來學習知識和研究學術的。古人有“學而優則仕”，今人有“為革命而學習”。這樣，判斷知識的是與非、真與偽的標準也是政治性的。這就是中國所特有的知識政治化。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分子，更注重不同於政治的純粹知識，他們是從純學術、純藝術的角度去進行學術研究，其方法和標準都不受政治的影響，而是有獨立的方法和檢驗標準。總之，政治性人格也是功利化人格，知識性人格也是超功利人格。

4.政治性人格的知識分子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是生死與共的關係，因而他們無法站在獨立的立場上對社會政治保持一種理性的批判態度，而只能採取功利性的辯護態度。他們非但不具

#### 4 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有獨立於政治的地位，反而是社會政治的有機構成部分。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分子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是分離的，他們始終站在獨立的知識立場上對社會政治保持一種理性的批判態度，是超然的批判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

5.由於以上各點，政治性人格的知識分子無法構成一種限制政治權力惡性膨脹的獨立社會力量，而是慫恿權力的不受制約和為所欲為；知識性人格的知識分子則構成一種獨立的，強大的限制政治權力的社會力量，使掌權者無法為所欲為（當然，限制權力的社會力量不只是知識分子）。極而言之，中國是一個知識政治化和知識分子官僚化的國家，如果把知識性人格作為衡量知識分子的標準，中國到現在也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而且，知識性人格既是從客觀的社會地位、職業分工的角度講的，也是從主觀的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價值取向的角度講的，所以，中國目前的職業分工並不能代表知識性人格。即便只從客觀的角度講，單純的職業分工也無法改變沒有立法保護知識的獨立性的現狀。

綜上所述，知識分子是一個以創造知識和傳播知識為己任的獨立的社會群體，他們對社會政治的態度是批判性的而非辯護性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恰恰表現在這種獨立的批判精神中。知識分子的這種自由主義的立場是限制政治權力的為所欲為的主要的社會力量之一。知識分子一旦失去了這種社會良知，就會導致人類社會中的災難之一——知識的權力化、政治化。目前世界上大量的殺人武器的存在，就是知識的政治化的惡果。即便在目前的民主國家中，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無法阻止



政客們把知識用於政治目的。如果知識分子本身再變成官僚，那就更可怕了。我很難相信，政客們製造殺人武器而不動用。權力的腐蝕作用是任何人都難以抵抗的。政治權力的存在本身，就標誌著人類的先天弱點和難以根除的做惡本性。人類到現在所能做的，僅僅是通過法律化的社會結構來限制政治權力，使人類之惡局限於特定的範圍之內。由暴力式的專制權力的交替到和平式的民主權力的交替，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西方知識分子從文藝復興開始所提出的民主原則，是民主政治代替專制政治的理論先導，是知識分子形成獨立的社會群體的標誌。沒有近代歷史上的知識階層的群體覺醒和獨立，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民主政治。

而在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取得過獨立於政治權力的社會地位。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是專制政治的組成部分，他們不僅在理論上為專制政體提供思想工具，更在人格上為官僚集團準備了豐富的人力資源，“助紂為虐”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所受的苦難因對政治權力的迷戀而變成晉升的階梯，他們對政治權力的指責因權力的幕後操縱而成為新權貴們的爭權奪利的工具。多少文化人在受盡專制者的虐待和玩弄之後，終於躋身於官僚階層之中；多少盡忠盡孝的文化人因專制政治的腐敗而屢遭厄運，被一步步地逼上梁山，懷著等待招安的心情而獨善其身。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不懂，政治是最黑暗的領域，陰謀、殘酷是政治的必然伴隨物，專制政治就更是如此。知識分子如果不爭取到獨立的權利，不對政治權力保持一定的距離和批判態度，而是任其膨脹並投入其中，

## 6 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那麼無論是皇袍加身者還是被權力拋棄者，都逃不脫或墮落或被吞噬的命運。我認為，政治權力不具有創造性，它既不能創造物質財富，也不能創造精神產品，但是政治權力在人類的生活中又起著巨大的、甚至是主宰的作用。這或許就是人類本身的不可救藥之處。政治的進步，不是權力的擴大，而是對權力的限制和政治生活的範圍的不斷縮小。現代民主政治，雖然已經達到了全社會從各個角度對權力進行制約，政體內部通過三權分立來對權力進行制約，但是，政治權力仍然不時地為所欲為。而中國的現實就更為可怕，在政體內部沒有制衡機制，在社會上是全社會的權力化和政治化，因此導致了中國人最殘酷的自我虐待。

因此，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控訴專制政治的邪惡，因為控訴已失去意義；更不想充當中國知識分子的辯護士，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為自己所做的辯護已經太多太多；而是想從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政治性人格入手，剖析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對政治權力的依服與崇拜。在中國，一方面是專制者糟蹋知識和知識分子，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自己糟蹋知識和自己。在“文革”後的憤怒控訴和痛苦呻吟之中，我所聽到的不是社會良知們的吶喊，而是愚昧者的乞求和自我美化。

我對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所進行的批判性反省，意在闡明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使命是爭取獨立的社會地位和發言權。阻礙這一任務之完成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不僅僅來自獨裁者階層，也不僅僅來自愚昧的大眾，更來自知識分子自身。因此，中國當代知識界必須在三個方向上同時

展開批判：

1. 批判長期的獨裁政體，以毫不妥協的態度爭取政治的民主化；
2. 批判愚昧的大眾，清除專制政治賴以存在的土壤，喚起全社會的覺醒；
3. 最主要的批判是知識分子的反省，使知識分子群體擺脫依服於權力的政治性人格。

這三個層次的批判要全方位的展開，在現實層面上涉及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全部現實，在傳統的層面上涉及到古代文化的再檢討。三種批判又是相互關聯的。對專制政體的批判的深度取決於對形成這種政體的社會土壤的剖析的深度，而前二種批判的徹底性又取決於知識分子的反省之徹底性。我認爲，缺乏自我批判和善於進行自我美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沒有對自身弱點的毫不留情的正視和對自身使命的自覺，就談不上對專制主義的真正批判和對愚昧大眾的思想啓蒙。

在批判的同時，中國知識分子要樹立一種多元化的價值觀，逐漸淡化乃至消除中國知識分子在價值取向上的政治一元性和政治價值優先的傳統。在中國沒有實現民主政治之前，中國知識分子還不能完全脫離政治，但也不能提倡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投入政治。在一個政治滲透一切的社會中，淡化政治意識就是反對政治獨裁。因而，目前中國的知識界，起碼可以從三個方面逐漸建立多元價值觀：

1. 一部份知識分子以理論的和行動的雙重方式投入反專制、爭民主的政治鬥爭之中，但是參加這種鬥爭的目的不是爲了躋

身於政治權力之列，而是爲了反抗政治權力的同化，爭取知識分子的獨立。

2. 一部分知識分子可以去從事經濟活動，增加金錢觀念而淡化權力觀念，以促成一個獨立而有知識的企業家、商人集團的誕生。但是，不能全民齊經商，因爲絕對的經濟主義也將導致知識的滅亡。

3. 必須有一部分“爲知識而知識”的知識分子，埋頭於創造知識、傳播知識的事業。這類知識分子要甘於寂寞、孤獨、清貧，超越政治地位和金錢等功利性誘惑，以促成一個純學術性的知識分子群體的誕生。這一部分人才是未來中國的獨立知識界。他們的特徵是：不僅厭惡專制政治，而且厭惡一切政治。在中國，選擇這種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其勇氣和智慧都要超過從政和從商的知識分子。我以爲，中國最缺少的就是這類知識分子。翻遍中國的史書，還找不到一個類似梵谷這樣的純藝術家，更難找到類似維根斯坦這樣的純哲學家。在戰火連天的世界大戰中，維根斯坦可以在戰壕中寫作他的哲學，而中國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很難“爲藝術而藝術”。我認爲，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這種超越一切世俗利益，甚至超越民族主義的純知識分子，即使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也需要。在救國、救民和救知識的選擇中，必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能夠置國破家亡、民不聊生於度外，而專心於創造知識。如果沒有這批知識分子，人所創造的知識將會在無數次社會動亂之中，被毀滅無數次。反過來，無論是何種政治，知識分子的全部投入都將是悲劇。中國需要方勵之式的有社會

良知的知識分子，更需要康德式的很少走出家門的知識分子。因為知識不止屬於某一民族，更屬於全人類；知識分子不僅僅為人類貢獻智慧，更為自我實現而從事“智力遊戲”。

最後，必須聲明一點：這本書不是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的歷史性的實證考察，而只是一種理性式的反省。我承認自己缺乏實證研究的能力，儘管我常常嫉妒那些實證大師的詳實。我由衷地希望能夠看到從實證性的角度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的著作問世。



# 目錄

---

## 前言 / I

## 第一章 / II

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 第二章 / 3I

以道德代替制度——“愚忠”

## 第三章 / 55

唯我獨尊式的自我美化

## 第四章 / 7I

知識份子的勞動化——現代愚民主義

## 第五章 / IO7

沒有信仰、不堅持真理的功利化人格

## 第六章 / I33

相互拆台、相互整治的知識界

## 後記 / I55

# 前 言

經過十年“文革”和十年“改革”，中國現行的專制政體之腐朽，已經是昭然於天下的事實。從1949年到1987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昏聩而又殘暴的專制政體之中所遭受的種種迫害，也已經盡人皆知。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坎坷命運，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荒誕劇。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未成爲一種與專制政體相對抗的獨立的社會力量，而是專制政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基礎之一。每一次整治知識分子的運動都有知識分子的主動參與；每一次迫害過後，基於個人恩怨的訴苦代替了對自身命運的自覺反省，基於尋求民主的忠誠代替了對專制制度的批判，基於逃避責任的自我美化代替了對自身責任的反思，基於向上爬的野心的獻媚代替了社會良知的覺醒。1976年“文革”結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文革”、“反右”、“批胡風”等政治運動的控訴和批判，既是祥林嫂式的“抗婚”、“捐門坎”，又是阿Q式的“唯我獨大”。二者合一，便是以乞丐式的請求和忠誠來感化獨裁者，以當婊子立牌坊的狡猾來美化自身。淚水和唾液、憤怒與虛榮、虔誠與投機……混合起來，淨化出一種虛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覺。這一切使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變得頗爲滑稽。一方面是司馬遷所早就指出過的“娼優”地位，另一方面是唯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救主的天降大任。儘管從魏京生到方勵之，反抗始終存在，但是這種反抗與愚昧而怯懦的知識分子群體相比，就顯得



## 2 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過於渺小。換言之，經歷了多次劫難的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達到群體性的自覺。發生於1989年年初的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簽名運動，儘管是1949年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行動的首創，但是對於其價值不可估計過高，對未來的前景也不可盲目樂觀。在這種團結一致的深層，隱含有各種各樣的動機，而且，與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波蘭的“團結工會”以及南韓、台灣等地的民主運動相比，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行動，實在不值得過於自豪。當然，我並不否定這次簽名運動的積極作用，並希望在這個良好的起點上達至更高的水平。千萬不能一簽上名就自以為是蓋世英雄，就拿出一種隨時準備大義凜然的姿態向社會展示。如果從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社會良知的角度看，簽名是一個關心社會政治的知識分子最起碼的責任與義務，就像捍衛知識的獨立性是知識分子的份內職責一樣。

獨裁式的政治權力是個只懂暴虐而不懂知識，只玩陰謀而不懂人性，只要功利而不要正義的惡魔。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荒謬之處就在於全身心地愛上了這個惡魔，為之生、為之死、為之搔首弄足，為之出賣一切。政治權力，是中國知識分子擺脫不掉的先天怪胎，有形無形地左右著他們的一言一行。這就是我在本書中集中批判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性人格。知識分子的政治性人格是相對於知識性人格而言的。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 在社會地位上，政治性人格的知識分子必須依靠於某種社會的政治力量，因而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而知識性人格的知識份子則不依靠任何其他的社會力量，只憑藉他們所擁有的